

# 第一章 緒論

政治功效意識 (political efficacy) 是選民對現有政治體系及其自身能力看法的一個重要政治態度，當觀察政治功效意識的變化時，我們就可以瞭解民眾對民主的評價或解釋其投票行為，因此，研究何種因素會影響到政治功效意識就顯得非常重要。本文認為選民的社會網絡以及大眾傳播媒介使用都是影響政治功效意識的重要變數。以下先說明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接著對相關理論與文獻予以探討，最後則敘明本研究之章節安排。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選民政治態度的研究一直是一個重要的領域，因為一旦掌握了選民的政治態度，就可以預期其後續的政治參與行為，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頗為豐碩。相關研究中，政治功效意識就是一個常被關切的政治態度變項。其中，外在政治功效意識指選民對於政府對其需求回應情形的認知，而內在政治功效意識，則是選民在政治體系中對自我能力的認知。政治功效意識是民眾對政府評價與自我政治能力的認定，其政治功效意識愈高，則政治信任、政治支持或者政治參與就有可能會愈高 (Almond and Verba 1963; Campbell 1954; Finkel 1985; 1987; Lee 2005)。Abramson (1983, 135) 就認為在美國的政治學界，政治功效意識的研究是僅次於政黨認同最被關注的領域，由此可見政治功效意識研究的重要性。

由於政治事務對一般選民來說是遙遠且不可及的，因此選民對於政治體系的認知程度經常必須依靠著外在的訊息來加以評估。選民對政治體系的瞭解程度，或是明白自己在政府決策過程中的影響力，以及政府對於民眾需求的回應性等，皆需透過相關資訊來源予以確認或釐清。也就是說，訊息提供者及訊息來源本身就有可能對選民的政治功效意識產生影響。在現今社會中，人民對於媒介的使用機會已經非常普及，無論是電視、報紙或者是雜誌等大眾傳播媒介都可隨時接觸，當選民吸收這些訊息轉化成為自己對政治體系的感受後，就可能對政治體系有了不同的意見或是肯定其對政治體系既有的看法，也對其政治功效意識產生了影響。當然，除了大眾傳播媒介的使用之外，選民的人際網絡也是另外一個訊息傳遞非常重要的樞紐。政治是一個人與人互動的過程，討論政治亦是一個非常普

及的現象，無論是在家庭內與家人討論政治，或是在家庭外與鄰居、同事及朋友討論政治皆然。而在政治討論的過程中，雙方就會交換自己對政治體系與政治事件的認知，也因此，人際間的政治討論會讓選民接收到與自己認知相同或者是不相同的政治訊息，自身對於政治體系的認知程度就有可能會因為政治討論之後而有所改變，也會促使政治功效意識發生變化。

觀諸國內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到基本上學者們都將政治功效意識當作自變項，去探討它與其他政治態度及行為的關係，諸如討論它與民主評價、政黨認同、投票對象、選舉參與、政治信任等變項的關聯性（王靖興、王德育 2007；李育任 2006；陳陸輝、耿曙 2003；陳義彥、陳陸輝 2004；彭芸 2001；2002；黃信豪 2006），當然亦有學者關切影響政治功效意識的因素，例如是討論媒介使用與政治功效意識間的關係（孫天龍 2006；張卿卿 2002a；2002b；2002c），也有討論台灣民眾的政治功效意識在經過政黨輪替後的轉變後，是否有整體系統性的改變（黃信豪 2005）。但是這些研究中並沒有將前述會影響到政治功效意識的相關變項——「社會網絡」以及「大眾傳播媒介使用」一同納入分析。本文即是在控制了選民的相關社會背景變數及政治態度變數後，納入此兩個主要的自變數，去檢視它們對政治功效意識的影響，並觀察影響的方向與影響力的大小。

## 第二節 文獻檢閱與理論基礎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選民社會網絡與其媒介使用對政治功效意識的影響，因此以下將對依變數——政治功效意識，做文獻的整理與回顧，從政治功效意識的測量、影響政治功效意識的因素及其對政治行為、政治態度等面向著手。另外，我們亦對社會網絡以及媒介使用這兩個主要的自變數進行文獻的探討。

### 一、政治功效意識的意義與測量

政治功效意識首先由 Campbell、Gurin 與 Miller（1954, 187-194）所提出，他們認為政治功效意識是「個人的政治行動對政治過程所產生的影響力，也就是值得個人去實踐其公民責任（civic duties）的行為。公民會感受到政治與社會的改變是可能的，並且可以在這種改變中扮演一定的角色」（Campbell, Gurin, and Miller 1954, 187）。而 Lane（1959）則認為政治功效意識的概念需區分為兩個不同的層面，即內在政治功效意識以及外在政治功效意識兩種，Balch（1974）在

其後的實證研究也支持 Lane 的看法。內在政治功效意識指涉人民是否自認為有能力參與政治的過程，並且能夠影響政治，而外在政治功效意識則是民眾相信政府官員對於人民需求反應的程度，而此也與人民對於政府體系的信任程度有關。

往後針對政治功效意識的討論都大體都以上述的兩個面向——「內在政治功效意識」以及「外在政治功效意識」——來進行。<sup>1</sup>由於政治功效意識與人民對於政府、政治體系的感受直接相關，其反應出人民對政治的感受程度，因此，要研究人民對政治態度到底為何，除了對政府的政治信任感受之外，政治功效意識是絕不可忽略的變項（Craig et al. 1990）。Weissberg（1975）就認為政治功效意識指涉民眾對政治行動的信念，而此信念也關乎行動是否有可能成功。換句話說，當我們認為某人具有高程度的政治功效意識，即是認為他相信政治行動不只是一種可能性，並且此政治行動也會帶來正面的影響。尤其若是要關注民眾與政府體系間的回應情形時，民眾的外在政治功效意識就是一項可供檢視的指標。值得注意的是，外在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信任感並非模糊而無法區分的，Iyengar（1980）指出外在政治功效意識並不像政治信任感一樣會測量到民眾對現任執政者的評價，而是能夠關注於整個政治體系對人民的回應能力，Craig、Niemi 與 Silver 等人（1990）的研究亦發現外在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信任感是不同的，前者是在指涉民眾對政治過程的感受是否公平，而後者則是意指政治菁英對民眾的回應情形。

而在國內的研究方面，郭秋永（1991）首先利用了「概念分析程序」說明政治功效意識在當代民主理論中的核心地位，並釐清政治功效意識的性質及分析內在政治功效與外在政治功效的兩種不同面向，他也說明並評價美國學者在政治功效意識此概念上所使用的相關變項，與相關的統計分析結果。吳重禮、湯京平與黃紀（2000）則是翻譯美國「全國選舉研究」（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NES）對政治功效意識的測量題目，並且觀察是否適用於台灣地區。在針對嘉義縣的研究結果顯示，內在政治功效意識與外在政治功效意識對該地區有相當的適用性，亦開啓了後續學者對台灣選民在內在政治功效意識與外在政治功效意識此兩層面上的研究。

不過政治功效意識除了在概念上區分為內在與外在政治功效意識兩個面向

---

<sup>1</sup> 後續有學者對政治功效意識的測量問項加以補充，例如 Niemi 等人（1991）就新增了四個內在政治功效意識的測量問項，結果顯示新指標的內在一致性高，效度亦夠，可提供給學術界當作新的指標來參考。郭秋永（1991）對政治功效意識的測量亦有相當詳盡的文獻討論。

外，亦有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Lee（2005）就提出了政治功效意識的第三個面向——集體政治功效意識( collective political efficacy )，他引述 Bandura( 1982; 1986; 1997 ) 的看法認為集體政治功效意識是「團體共同認為能夠一起組織及採取行動以達成特定目的的一種信念」(轉引自 Lee 2005, 299)，故根據此觀點來說，團體的集體政治功效意識就像是個人的內在政治功效意識一般。他認為每個人都會有其歸屬的團體，但並不代表在此團體中的成員都會分享共同的信念，所以研究集體政治功效意識是必要的。在他對香港的研究發現，集體政治功效意識是屬於政治功效意識的另外一個層面，而香港民眾則擁有高程度的集體政治功效意識，並且集體政治功效意識與對民主政體的支持和政治參與二者間有顯著的正向關聯性，Lee 最後也認為集體政治功效意識是研究香港人民的意見以及其政治參與情況相當重要的變項。

上述研究顯示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體系是相當密切的，選民對於政治體系的感受相當程度反應在政治功效意識的層面上，因此就可以據以觀察選民的政治參與和政治行為，也可以藉由觀察選民政治功效意識的分布和趨勢，檢視政治體系與人民間的聯繫是否足夠。故研究政治功效意識的就有其意義存在，而在瞭解政治功效意識的內涵之後，接下來將討論影響政治功效意識的相關因素。

## 二、影響政治功效意識的因素

有了對政治功效意識的概念後，接下來要探討的就是何種因素會影響到政治功效意識的形成。首先，Abramson（1972; 1983）認為種族會對政治功效意識有所影響，在他對黑人孩童與白人孩童政治功效意識的研究指出，其認為黑人孩童比起白人孩童來說，政治功效意識是較為低落的，他提出了四種解釋途徑說明此一現象：

- (1) 政治教育解釋途徑 ( political-education explanation )：其認為政治功效意識的不同是起因於美國學校政治教育方式的差異，黑人孩童被教導不要在政治活動上有積極的參與行為。
- (2) 社會剝奪解釋途徑 ( social-deprivation explanation )：認為當人們被社會剝奪機會時自信就會較為低落，使得政治功效意識亦會降低。而黑人正是被社會所剝奪的，因此其政治功效意識會較低。
- (3) 智能解釋途徑 ( intelligence explanation )：此途徑認為智能與政治功效意識有很高的相關性，有豐富的研究顯示黑人孩童以及其他次文化的弱勢孩

童，他們的智能是比白人孩童來得低。然而智能的差異有可能也是環境所導致的，也就是說此種解釋途徑可以與社會剝奪解釋相結合。

- (4) 政治現實解釋途徑 (political-reality explanation)：此解釋認為黑人所具有的政治權力是比白人來得低落，因此他們的政治功效意識也會較低。

Abramson (1983, 160) 認為在以上的四個解釋途徑中以政治現實解釋途徑最具有解釋力，這是因為政治教育、社會剝奪以及智能等解釋途徑都是單純地以社會或是心理屬性 (attribute) 作為出發點，這些相較於以外在政治環境進行解釋的政治現實途徑，顯然政治現實途徑對政治功效意識更具有解釋力。另外，Form 與 Huber (1971) 同樣是針對黑人進行研究，他們發現黑人對政治體系體現出來的無效能感 (inefficacy) 是由於黑人認為政府是被利益團體所掌控，也就是被企業家以及具有權力的菁英階層所控制，因而感受到與政府有所距離以及效能感低落。

除了 Abramson (1972; 1983) 對黑人孩童的研究之外，Easton 與 Dennis (1967) 則以 Campbell、Gurin 與 Miller 等人 (1954) 的研究為基礎，修正了對孩童政治功效意識研究的相關問項後進行探討。其結果顯示孩童在三年級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形成態度，而此種態度即是政治功效意識。例如在針對三年級的研究裡面，有四分之三的學生具備有政治功效意識的分數，但他們同時也認為孩童無法去區分「我們應該對政府做什麼」，以及「政府事實上正在做什麼」。另外，孩童的政治功效意識除了會因為年級的升高而有所增加之外，智能 (IQ) 的高低與家庭的社會經濟背景因素都會有所影響。然而對於 Easton 與 Dennis 的研究則有學者加以批評，Sears (1975) 即認為其問項的測量是有問題的，因為問項測得的只是孩童對於目前執政者的想法，而非孩童對於政府體制運作的一般化概念。另外，White (1968) 針對小學生政治功效意識的研究則指出，年級 (也就是年齡) 以及個人的智能 (IQ) 可以用來解釋政治功效意識，並且作者認為智能對政治功效意識的解釋力高於社會階級的解釋力。但是 Jackman (1970) 則認為此結論有待商榷，他批評 White 所使用的統計方式並不恰當，並且其研究設計亦忽略了變數的共線性情形。

Easton 與 Dennis (1967) 和 White (1968) 等人都認為智能可以用來解視政治功效意識的高低，不過 Abramson (1983) 卻認為政治現實的解釋途徑是更為恰當的。Bobo 與 Gilliam (1990) 就有著類似 Abramson 的觀點，他們認為個人

的政治態度會與現實的政治環境有很大的關係，而提出所謂的「政治賦權理論」(political empowerment theory)，其意指一個團體在政治上具有代表性並且在決策上具有影響力時，其團體成員的政治參與情形會有所上升，也就是說原本是處於弱勢團體的成員，會因為團體中有成員擔任政府官員，而使得該團體成員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增加。Bobo 與 Gilliam 對黑人的研究就指出，在黑人擔任市長的地區，當地的黑人民眾會對政府較為信任，並且政治知識的程度與政治功效意識都會較高。

吳重禮、譚寅寅與李世宏(2003)進而修正了政治賦權的概念以研究台灣地區的賦權效應，其發現在民進黨執政較久的區域，選民會趨向支持民進黨的候選人；反之，若是在國民黨執政較久的地區，選民則會傾向支持國民黨與親民黨的候選人，換言之，以賦權理論的角度出發，當弱勢團體的成員有機會躍上政治舞台時，其所屬團體成員的政治功效意識亦會有所轉變。陳陸輝與耿曙(2003)則以2002年北高市長的選前調查資料，檢視民眾對中央與市府兩個不同層級政治功效意識的現象，研究結果發現在馬英九執政的台北市，其泛藍選民的政治功效意識顯著較高，但是該群選民對於綠色執政的中央政府，政治功效意識則較低；而就高雄市而言，其與中央政府同屬綠色執政，也使得泛綠選民在此二者的政治功效意識上都是顯著偏高的。此顯示了在民眾居住地區中，政府對民眾的回應性與否和民眾對政府的政治支持間有顯著的關聯性。

以上台灣學者的研究顯示政治賦權效應與政治功效意識有一定的關聯性，亦即，當認同執政黨的選民在被詢問到相關政治功效意識的問項時，就有可能會認為政府對他們的回應性是足夠的，而選民本身亦認為能夠了解執政黨政府在政治上的運作方式。此相當程度反應出選民所處環境的重要，也就是當選民所認同的政黨執政時，其所得到的資訊內容都是認為執政當局會重視該團體成員的需求，同時選民也認為他們對執政的政黨具有影響力。換句話說，當政治賦權的現象所強調的是一種政治系絡效應(contextual effect)的時候，意指選民會因為外在政治情勢的不同，而使得他們產生不同的政治態度。

除了外在環境會對政治功效意識有所影響，另外，Finkel(1985)的研究顯示出政治參與會增強民眾的政治功效意識，無論是投票或者是選舉參與都會使得民眾的外在政治功效意識有所上升。在其之後對西德的研究也發現參與競選活動對政治功效意識會有所影響，Finkel(1987)認為這是由於民眾在從事政治活動時他們會對政治體系更加熟識，並且有所關聯，更進一步來說是民眾會認為自己

具有能力可以影響政治的結果。其研究不同於學者們認為政治功效意識只是單方面有助於政治參與（Almond and Verba 1963; Campbell, Gurin, and Miller 1954），而是政治參與本身也會提高政治功效意識。

在國內的研究上，袁頌西（1972）針對國小學生的研究指出只有年級（年齡）此一變數對其政治功效意識會有所影響，而在其後對家庭與學童政治功效意識的影響研究中，發現家庭的政治社會化程度以及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都會對學童的政治功效意識有所影響（袁頌西 1974a；1974b）。陳陸輝與陳義彥（2002）在觀察了 1992 年至 2000 年的資料顯示，民眾內在政治功效意識的分布是較為穩定的，而外在政治功效意識則是在政黨輪替後有明顯地提升，另外，他們也發現內在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知識有關，而外在政治功效意識則與政治興趣和政治信任感的關聯程度較高。接著黃信豪（2005）有類似的研究結論，他對於台灣民眾 1998 年至 2003 年政治功效意識的研究顯示，以內在政治功效意識而言，其長期趨勢是較為穩定的；而以外在政治功效意識而言，其在政黨輪替之後則出現了顯著的正向成長，他認為這種結果顯示了民眾對於政治體系回應力感受的增強。同時，黃信豪（2006）也發現，就代表自我政治能力評估的內在政治功效意識而言，其是民眾從事選舉活動參與相當重要的一個心裡基礎。另外，陳義彥與陳陸輝（2004）在觀察了 1991 年與 2001 年對大學生的調查資料顯示，其內在政治功效意識及外在政治功效意識都呈現顯著的下降情形，並且大學生的外在政治功效意識愈高者，愈傾向給予台灣民主運作較高的評價。

而陳陸輝與黃信豪（2007）則提出「學校功效意識」此項概念，亦將其區分為內在功效與外在功效兩種，前者指涉學生相信自己具有了解學校事務、認知學校決策或運作過程的能力，而後者則是學生相信學校對於學生需求有所反應或是重視的程度。他們的研究結果發現，與政治功效意識相較來看，學生的學校外在功效意識較其外在政治功效意識高，不過整體而言，不論以學校或者是政治體系為對象，多數的台灣大學生認為「體制」對於個人是缺乏回應的。並且在觀察了內在政治功效意識後，發現大學生相較於全體民眾而言，具有較高的批判或反省既有政治體制的傾向。王靖興與王德育（2007）則是以 2004 年的總統選舉為例，將政治功效意識視為依變數，檢視選民的投票行為及助選活動的參與是否會影響其政治功效意識，其研究成果指出，民眾的政治參與行為必須與其主觀期望的結果相一致時，其政治功效意識才會有明顯地增加，若是單純的投票行為或者是助選活動本身，對政治功效意識並不會產生任何的影響力。

以上的研究顯示，無論是就種族、所處社會環境、政治活動參與等，都會對於選民的政治功效意識有所影響，不過如果仔細探究政治功效意識的內涵，則資訊可以說是影響政治功效意識的另一個重要面向。由於政治功效意識指的是選民對於政治體系與自我政治能力的認知情形，而此種認知相當程度需要依靠外在的資訊來加以評價與確認，因此，如果一個人處在意見同質的團體中，大家都認為政府會對選民的需求會有所回應，並且也會因為對政治討論程度增加，而愈瞭解政治體系的話，那麼其內在與外在政治功效意識就有可能增加，當然，接觸到與自己不同的意見時，其政治功效意識亦有可能產生變化。另一方面，資訊的交流並不只限於在團體中與他人的討論而已，當選民接觸到大眾傳播媒介的訊息時，也會轉化成爲自己對政治的看法，而影響到其政治功效意識。故，以下將就「社會網絡」以及「大眾傳播媒介使用」等兩個會影響到選民訊息的層面，來討論對選民政治功效意識的影響。

### 三、社會網絡與政治功效意識

在進行社會網絡的討論之前，我們必須要先區分網絡（network）和系絡（context）的不同。系絡屬於結構性的，而網路則是個人所建構而成的，系絡因此包含著個人的網絡，而個人網絡的形成卻又會受到社會系絡的影響（Huckfeldt and Sprague 1987, 1200）。對於個人網絡的研究最早是出現在 Lazarsfeld、Berelson 與 Gaudet（1948）的 *The People's Choice* 一書中，在該書中提出兩階段訊息傳播的概念，認為人際關係在訊息傳遞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尤其在競選的時候，不同的競選傳播方式中，人際間的政治討論現象甚至會比暴露在媒體的時間上更爲頻繁，尤其是針對那些還沒有決定投票對象的選民，或者是對於政治較無興趣的選民，政治討論與人際關係網絡更會對他們具有影響力，在這種影響力之下，團體最後就會形成一種和諧（homogeneity）的狀態。Lazarsfeld 等人的研究被視爲解釋選民投票行爲的社會學研究途徑（或稱爲哥倫比亞學派）開端，他們利用選民的社會背景去解釋其投票行爲。其論證出個人政治行爲是一個社會的經驗，在個人做出政治決定的過程中，會在所處的社會環境與他人分享資訊以及觀點，因此選民常被視爲是處於一個特定的社會環境之中，並且受其影響。

選民處於特定的社會環境會對其政治態度有所影響，而 Huckfeldt 等人亦認爲透過社會互動所建構出的人際網絡，會成爲一個過濾器，去濾除複雜的政治訊息，也因此提供訊息者最主要的就是人際網絡中的成員（Huckfeldt et al. 1995），



故以此而言，政治討論者就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面向。在此，我們可以區分為兩個部分來看，第一個部分是在家庭以外的政治討論者以及選民所處社會網絡產生的影響；第二個部分則是家庭內成員對選民政治態度的影響。

在家庭外社會網絡的研究首推 Finifter (1974)，她探討當團體中有少數意見時，表現出來的行為是如何。其利用了底特律汽車工廠的例子來進行說明，觀察的時間點在 1960 年時甘迺迪與尼克森的總統大選之後，總共訪問了 419 個成員。在這個汽車工廠的環境中，無論是藍領階級或是聯合汽車工會的政治偏好，大部分的人都是偏向民主黨，少數的人是屬於共和黨員，因此她假設在工廠中會形成以傾向民主黨為主的初級團體 (primary group)，不過她卻發現：當朋友間的情誼愈加深的時候，民主黨在此扮演的角色會愈小，而共和黨扮演的角色則愈為重要，也就是說形成初級團體的成員大多是以偏向共和黨為主。其對此現象做出解釋，她認為政治上的態度會影響到個人的交友模式，亦即這是因為這些共和黨員受到了外在環境的排擠，而有去找尋屬於自己團體的動機。其次，少數支持共和黨的工人也能夠藉由此種團體的形成而獲得對自己意見肯定的評價。最後，由於共和黨工人認知到自己是屬於少數團體的成員，因此他們會更加有動機去尋找和他們相同意見的人，以避免產生與自身認知不和諧的情形。之後作者運用了和上述底特律工廠相同特性的範例來進行理論推衍，其適用在諸如種族、宗教、社會階級、工會成員等方面，同時，她在最後亦說明這些政治態度上的少數分子會較多數人來得更為凝聚、具有更多相似態度的朋友，以此避免外在環境對他們產生的壓力。Finifter 的研究檢視了團體中多數的同質意見以及少數的異質意見之互動情形，打破傳統認為多數意見就會有較高凝聚力的觀點，其研究顯示弱勢團體成員之所以會有聚合的傾向，正是由於他們的意見和想法是社會上的少數，為了找尋與自己相同看法的人，他們會比持多數意見者更為凝聚，也使得日後在探討選民與其政治討論者的關係時，學者們會關注在政治討論者與選民的觀點是否相同此面向。

例如，Huckfeldt 與 Sprague (1987) 就根據對美國印第安那州南灣居民的研究顯示，在認同候選人的層面上，受訪者的政治討論者其政治傾向會有與受訪者相當高的相似性，亦即當人們有政治偏好時，會選擇與其偏好相同的政治討論者。另外，他們也提及政治資訊及政治偏好間的關係是雙向的，選民會因為其政治偏好去選擇要接收的資訊，但同時接受政治訊息也會形塑其政治偏好。最後，作者回應了 Finifter (1974) 的論述，認為少數意見的民眾較能夠認知到環境與

其自身偏好的改變，相對來說，多數意見則常常忽略掉少數意見的存在。

除了政治討論者對選民的影響之外，Burbank（1987）的研究則認為社會系絡本身就對選民的投票抉擇具有影響力，他使用美國與英國總共六個社區的訪問資料顯示，當選民知悉所處的社區對某政黨有所偏好的時候，爲了要節省資訊取得的成本，他們就會依據此種資訊來進行投票。Huckfeldt（1979）針對美國水牛城的研究也指出居住在高社會地位的地區時，會受到鄰居的鼓勵而前去投票，Giles 與 Dantico（1982）進一步將 Huckfeldt 的理論運用在 1972 年的全國性面訪資料上，除了得到相似的結論之外，他們亦認為個人的政治經濟地位若上升，在系絡中的地位也會跟著提升，因此會與較高社會地位的選民有更多的互動，從而加強了政治參與的行爲。Beck（2002）則在觀察選民爲什麼在 1992 年的總統大選會投票給除了布希及柯林頓以外的其他候選人之後，有類似的結論。其發現如果選民的政治討論者是支持第三政黨或者是其他的獨立參選人，又或者是此位選民所處的社會系絡有此相同偏好的話，那麼此位選民就會去支持除了兩大黨之外的候選人，亦即其選擇受到了所屬系絡的影響。但亦有學者認為選民的居住地區與其政治行爲並無關聯（Eulau 1986; Kelley and McAllister 1985）。

另外，Huckfeldt、Johnson 與 Sprague（2005）觀察在選民的溝通網絡中，與政治討論者的意見是同質或者是異質時其溝通網絡會有何種差異，他們發現一個政黨傾向強烈的人，若他的討論者是和他支持相同的政黨候選人時，則是會高度同意此討論者的，但是當此人的政黨傾向強度並不高的時候，選民是否同意此討論者的意見，要視這個網絡對候選人的偏好分布來做決定。亦即，強烈的政黨認同者是比較不被網絡中的資訊所影響，他們不太可能同意和其不同政黨支持者的意見，也不會受到網絡中政治偏好分布的影響。這也是如同 Beck（1991）所言，在此類選民中，網絡主要是在增強他們的政治偏好，而非轉變其政治偏好。

由以上的文獻我們可以得知，當選民具有強烈的政黨偏好，或者是他們的政治偏好強度很強的時候，他們就不會受到政治討論者或者是所處社會網絡的影響而改變其政治態度；但是反觀政黨傾向以及政治偏好較弱的選民，他們就會受到政治討論者或者是社會網絡的影響，而在政治態度上有所改變，在這類選民中，網絡就形成了政治訊息傳遞的中介樞紐（MacKuen and Brown 1987）。而將之運用在政治功效意識此項政治態度上時，我們也會預期政治意見定向不明或者是微弱的選民，其政治功效意識會受到所屬網絡以及政治討論者的影響。

另外，Mondak（1995）則是同時考量媒介使用與社會網絡在政治討論上是

互補或者是屬於衝突的關係，他認為就媒介的暴露程度而言，會促使選民在特定議題上的討論，因此與社會網絡在政治討論上是互補的關係，但是就何者的影響力較大來看，由於當選民暴露在社會網絡以及媒體的資訊管道時，其資訊來源是多元的，因此單一資訊管道所能發揮的影響力有限，在這個情況下媒介就與社會網絡就處於一種衝突的關係。

除了家庭外社會網絡的研究之外，家庭成員對於政治態度影響的研究也不可忽略，其中一個研究就是將焦點著重在夫妻之間的政治態度層面上。Straits(1990)就在觀察1980年至1984年間夫妻的投票行為後發現，夫妻間的投票率會較其他選民來得高，並且其投票行為也呈現出一種穩定的狀態，因此，夫妻間的網絡關係是不可忽略的。不過他也認為即便夫妻間的教育程度、年齡以及其他的社會背景是相似的，但是會由於夫妻所處工作環境的不同，也使得政治資訊傳遞的方式有所差異(Straits 1991)。Stoker與Jennings(2005)就使用定群研究(panel study)的資料顯示，夫妻雙方的影響力在政黨認同、投票選擇以及宗教議題等項目上都是持續存在的，而影響力也會因為婚姻持續愈久而有增強的趨勢。他們認為這是基於以下兩個理由：第一、即便政治議題並不是大部分婚姻所關注的，但是當夫妻之間在彼此的生活中變得愈來愈重要的時候，雙方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就會慢慢出現，這是由於夫妻在政治上的妥協常有助於維持婚姻的和諧程度使然。第二、對於婚姻歷程較為長期的夫妻來說，其影響力會大於婚姻歷程較為短期的夫妻。以研究的兩波訪問資料為例，第一波訪問的夫妻約有五分之一在第二波中離婚，換言之，婚姻關係薄弱者就會被淘汰，因此存留下來的婚姻關係較為穩固，其影響力也較大。

至於國內對於社會網絡的研究，首先有盛杏媛(1991)針對1989年台北市以及台北縣選民的分析，其發現選民討論選舉愈多則他們投票的可能性會愈高，並且，里鄰關係愈密切，投票給國民黨候選人的機率會愈高。

接著劉義周(1991)與陳陸輝(1994)則是對國民黨責任區制度的輔選效果有深入的討論。在觀察1980至1989年的四次台北市立法委員選舉後，劉義周(1991)認為國民黨的責任區制在輔選效果上的確有其成效，有責任區者的得票數較為集中，並且得票率變異大，其平均得票率在責任區內會顯著高於責任區外，並且，在行政區內，得票率最高的候選人，就是配得該區為責任區的候選人，其認為責任區的影響力甚至高過於候選人的地緣關係及其形象。劉義周(1991)指出之所以責任區有其優越性，正是由於國民黨能夠掌握地方的人際網絡，也因

此能夠在選舉時發揮影響力。

同樣是針對國民黨對候選人輔選效果的研究，陳陸輝（1994）將焦點著重於黃復興黨部，其觀察 1989 與 1992 年的立法委員選舉後發現，黃復興黨部所提名的候選人在眷村的得票率是穩定且高的，甚至一些具有全國性知名度且形象好的候選人，在眷村人口比例佔該村里比例較大者，其得票率也不如黃復興所提名的候選人，由此可看出黃復興黨部的輔選確有其效果存在。陳陸輝（1994）同時也認為，黃復興黨部會具有影響力，正在於其在眷村當中具有相當綿密的人際網絡，因此於選舉時可以加以組織動員而使黨所提名的候選人順利當選。上述的研究均強調了人際網絡在選舉時的重要性，對地方的人際網絡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在選舉時就可以發揮相當程度的影響力。

後續黃秀端（1995）針對 1994 年省長選舉中選民參與的競選活動進行分析，她認為社會網絡中的動員情形是促使選民參與各項競選活動相當重要之因素。研究發現，設籍台北市的大陸省籍人士其參與競選活動之程度較高。另外，經常和朋友討論政治者以及政黨認同感較高者較熱烈參與。並且，地下電台的動員也激起不少選民之熱情，而紛紛投入各項競選活動。

蔡佳泓（1995）則是探討 1989 年台北市南區立法委員選舉中，選民所處的社會網絡對於投票選擇的影響。文中將選民的社會網絡位置加以分類，區分成動員者、不被動員者以及被動員者三種，研究發現這三種選民在人口特徵上並無多大差異，但是在社會態度上卻有積極參與以及消極參與之分別。動員型選民的政治參與程度最高，不被動員型選民最低，而動員型選民較偏好國民黨，被動員型較喜歡民進黨，不被動員型的政黨偏好則意向不明。接著他針對 1994 年的省長選舉和 1996 年的總統選舉探討省長選舉的投票決定因素（Tsai 2001），並以總統選舉資料來測試模型的適用程度。其發現在省長選舉中，被拉票的次數以及對政黨的認同強度會決定選民前去投票與否，而在總統選舉中，只有對候選人的偏好是顯著的影響因素。亦即候選人特質愈突出，愈能號召選民前去投票，而社會網絡和政黨偏好強度的影響力則在總統選舉中降低，他解釋這是由於單一選舉區強調候選人因素所造成的結果。

張佑宗與趙珮如（2006）對於 2004 年立法委員投票的研究，則在考量個人與其他討論對象的政治內容方向和密度，以及選民所居住的地理區域後，發現政黨認同仍是影響選民投票抉擇最重要的因素，不論是泛藍或是泛綠的認同者，居住在其支持陣營比較弱勢的地區時，最後投給其認同陣營的比率，會高於同樣認

同其陣營，但居住在其陣營得票率較高的村里。另外以地理區域而言，居住在北部的選民，教育程度愈高愈會支持泛藍陣營。其研究說明了居住在認同陣營較為弱勢的村里，反而較具有凝聚選票的效果（張佑宗、趙珮如 2006, 32），這相當程度回應了 Finifter（1974）認為持少數意見選民會比持多數意見選民來得更為聚合的觀點；另外其研究與 Huckfeldt、Johnson 與 Sprague（2005）的發現亦有相似之處，都是認為政黨認同是主要的決定因素，選民若有強烈的政黨認同，則其政治討論者與社會網絡的影響力就會相對降低。

有了對社會網絡研究成果的認識之後，接下來要討論另外一個變數——媒介使用，去觀察媒介使用與政治功效意識間的關係為何。

#### 四、大眾傳播媒介使用與政治功效意識

媒體早已是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們可由不同的媒體獲得許多資訊，而在現代社會訊息愈來愈複雜的時候，媒體更扮演著一個重要傳遞訊息的地位。例如，在台灣的有線電視方面就有多達六家以上全天候播放的新聞頻道，<sup>2</sup>每逢選舉時，這些頻道藉由新聞報導給予選民許多的訊息，而彭芸（1992）就曾指出電視新聞是選民選舉資訊的主要來源。另外，電視與廣播的政論性節目，以及報紙、雜誌等對政治的相關報導，也都是選民可以獲取資訊來源的管道。因此，這些媒介在對選民傳遞訊息時其影響為何就非常值得加以探究。

基於以上的觀點出發，就有學者將焦點著重在媒介使用與政治功效意識的層面上，去觀察選民在接觸不同的媒介之後，對其政治功效意識是正面或是負面的影響。如 Figert（1976）使用 Almond 與 Verba（1963）的研究途徑來討論媒介暴露與政治能力的關係，在對美國、英國、德國、義大利與墨西哥五國資料的分析發現，當選民在報紙、雜誌、廣播或者電視等媒介接收公共事務資訊愈頻繁時，其政治能力會愈高。Miller、Goldenberg 與 Erbring（1979）也發現愈常閱讀報紙的民眾政治功效意識會愈高，同樣的結論在 Newhagen（1994）探討非裔美國人的研究中也得到證實，不過 Newhagen 同時指出觀看新聞性的電視節目以及收聽治性的廣播 call-in 節目也會有助於提昇選民的內在政治功效意識。而 Semetko 與 Valkenburg（1998）在對德國民眾的研究也發現電視新聞的使用程度與內在政

---

<sup>2</sup> 這六家有線電視新聞頻道包括了有年代新聞台、東森新聞台、中天新聞台、民視新聞台、三立新聞台、TVBS-N 等。

治功效意識有正向的關聯。

Norris (1996) 的研究則依循 Putnam 所提出社會資本的概念，重新檢視媒介的使用是否會對社會活動參與的不同面向有所影響，其分析顯示就個人的基本背景變項來說，教育程度幾乎都會影響到社會活動參與的各個面向，而就媒介使用來看，報紙與觀看電視的公共頻道都會對社會活動參與產生正向的影響。另外，Norris 進一步討論媒介使用與政治態度的關係時，發現到報紙的使用以及觀看電視新聞，都會對民眾的政治功效意識有正向的影響。

不同於前述分析是著重在選民觀看電視新聞對與其政治功效意識的分析，Arts 與 Semetko (2003) 針對荷蘭民眾的研究顯示，觀看公共電視頻道會有助於提昇民眾的內在政治功效意識以及投票參與，同時使用報紙與雜誌等媒介也會對民眾的政治功效意識有正面影響。

另外一方面，亦有學者將研究的面向擴展至投票率低落的原因，去探究是否因為媒介傳遞負面訊息，而使得民眾的政治態度有所轉變，導致投票情形不踴躍。他們認為在選舉時期的負面競選廣告由於充滿了攻訐等訊息，因此讓選民在觀看此類廣告時會對選舉過程及政治體系感到失落，進而使得選民的政治功效意識下降，而不願投票 (Ansolabehere, Iyengar, and Valentino 1994; Ansolabehere and Iyengar 1995, 2000)，但是對競選時期新聞的研究卻發現有助於提昇選民的政治功效意識以及投票意願 (Pinkleton, Austin, and Fortman 1998)。

同樣是針對選民投票行為的研究，Beck 等人 (2002) 分析不同的社會媒介是否會影響選民在 1992 年美國總統選舉的情形，其研究指出，就大眾傳播媒介而言，選民認知到報紙新聞的立場以及實際上報紙的新聞內容，這二者對選民的投票行為不會有所影響，但是報紙上的社論，以及選民對電視新聞內容的認知，就對其投票行為產生影響。

至於國內的研究則有張卿卿 (2002a) 去探討競選框架和廣告訴求對於選民政治功效意識的影響，以實驗法進行的研究結果發現，暴露於策略框架或議題框架的競選新聞對選民的外在政治功效意識有顯著影響，但是對於其內在政治功效意識則無影響，而廣告框架對於內外政治功效意識都沒有影響。在其同年對大學生的研究也發現，政治媒介的使用會對於內在政治功效意識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同時也會提高大學生的政治參與 (張卿卿 2002c)。另外，針對全台灣的電話訪問調查顯示，對於各別不同的媒體使用或注意程度來說，會對內在政治功效意識同時具有正向及負向的影響，但若將這些媒體使用一起納入模型檢視，則對

內在政治功效意識的影響並不顯著（張卿卿 2002b）。

孫天龍（2006）則是將媒介使用區分為媒介暴露程度以及媒介注意程度兩者，去觀察它們在非選舉時期以及選舉時期的期間內對民眾政治功效意識的影響。其研究結果發現在非選舉時期時，民眾媒介的注意程度愈高，政治功效意識會愈高，但是對電視新聞的暴露程度愈高時，內在政治功效意識卻會愈低。至於在選舉時期，民眾的媒介的暴露程度與注意程度和政治功效意識是無關的，其認為這正代表了政治功效意識是深植於民眾心中的穩定政治態度，因此在選舉時期的媒介使用並不會與政治功效意識產生關聯。

以上的文獻顯示媒介使用基本上對政治功效意識會產生正面的影響，不論是對報紙、電視、廣播、雜誌等使用皆是如此，不過有學者認為若是這些媒介傳遞的是負面訊息時，會因此造成選民對政治體系的不滿，就會降低選民的政治功效意識，因此媒介所傳遞出的訊息為何就顯得相當重要。

### 第三節 章節安排

本研究共分四章。在本章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以及對相關理論與文獻進行探討，之後在第二章則說明研究架構及所需之相關變數，並且敘明資料來源與研究假設。第三章將對主要的資料進行分析，對依變數與自變數做初步的描述性分析，檢視台灣選民整體政治功效意識的情形，以及選民在社會網絡和媒介使用上的情況，同時亦以交叉表、卡方分析及 $\tau_b$ 檢定等方式討論變數間的關聯性，之後則進行模型的整體分析，使用二元勝算對數模型（binary logit model）觀察各個自變數對依變數的影響，並且驗證研究假設是否成立，並且對模型呈現的結果進行詮釋與說明。最後一章則整理研究發現以及結論，並對未來相關研究提出建議與說明。

